

译者序

摇摇贝里奇教授为外交理论课程教学编撰而成的《外交理论：从马基雅弗利到基辛格》一书，旨在通过阐述、评论历代外交学方面的经典作家及其主要作品，展现从文艺复兴时期到冷战末的外交学发展轨迹。本书虽非皇皇巨著，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是一本便于普及的“外交学经典著作”导读。

首先，本书选取的学者有代表性。从现代外交诞生之初着笔，以极具哲学家气质的马基雅弗利开篇，沿着外交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逐一介绍了意大利、荷兰、法国及英国的另外七位外交学或国际法学方面的著名学者^①，最终以美国现实主义的外交实践大家基辛格收尾。在一定意义上，该书结构安排本身反映了外交学自身的发展趋势以及外交学与政治学、国际法学交叉的学科特点。其次，书中介绍的作品经过了精心筛选。本书所选取的学者绝大多数既不是职业外交人员，也不是学院式的外交学研究者。虽然这些学者的著作颇丰，但却不限于，甚至不属于外交学范畴。只有对这些学者的全部著作进行筛选，对这些精选出的著作进行梳理，才能有针对性地找出具有外交理论意义的作品。从表面枯燥或看似不相关的东西里发现有真知灼见的材料，要求研究者必须具有博学的头脑、敏锐的眼光、清晰的逻辑。从这种意义上说，本书既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些学者的外交理论提供了资料基础，也为我们学术典籍的浩渺海洋中寻找外交学的理论文献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科学方法。最后，本书客观平实而又多角度地展现了各个思想家的原貌。本书的作者不是简单地罗列各

^① 本书的第三章还用大量篇幅分析了另一位著名的外交学及国际法方面的经典学者真蒂利及其代表作《代表权》，真蒂利可以说是研究外交豁免权的鼻祖之一。

位学者及其著作，而是通过研读被研究对象的全部作品（甚至私人日记），参考历代各种传记，结合被研究者所处时代的特征，对其一一做出中肯的评述。在评述时，也没有片面地叙述一家之言，而是本着求实的态度进行褒贬。历史评论的分歧与疑难之处，作者给予了保留，这无疑也为读者留出了自由思考的空间。

目前，国内除陈乐民与王福春分别编撰的两本《西方外交思想史》以外，系统介绍西方外交思想的书籍可谓少之又少，西方学者的译著也十分罕见。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在激发人们对外交及其理论构架兴趣的同时，也为人们进一步深入学习外交理论提供了帮助。当然，本书也并非完美无缺。作为西方学者，本书编者必然将目光集中在西方世界，忽略了东方外交思想的意义，这无疑是本书的一大缺憾。而外交学的学科建设本身尚不成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本书的编撰造成了一定障碍。

本书的翻译由本人和高飞博士共同完成。翻译期间得到了包括原作者在内的众多人士的帮助，特别是北大出版社的张盈盈编辑为本书的审订付出了大量的艰辛工作，在此深表感谢。由于译者的水平有限，在译文和注释上难免存在语意不达之处，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陆悦璘

外交学院

二〇一〇年 九月

前 摇 摇 言

莱斯特大学政治学系保持着一个悠久传统,通过“政治学经典著作”来教授政治学理论,该系的现任或前任教师已经出版了三本关于这些经典著作的导读论文集。因此,当该系随后开始教授外交理论时,也就很自然地想到要给“外交经典著作”出一本导读。按理来说,编写一本外交“文集”,就很有必要慎重选择作者,而不只是简单地搜集一些文章。但是我们发现对于这一特殊的文集,其编辑原则很难界定。也许正因为外交经典著作本来就稀缺,加上又要进行筛选以找出有价值的作品,这使得此类书籍特别有价值。我们希望本书将不仅仅激发起人们对外交理论的兴趣,还能成为外交理论课程首本平易的教科书。

本书导言部分由我负责,在此莫里斯·基恩斯(莫里斯·基恩斯)和奥特(奥特)给出的建议使我受益匪浅。奥特虽是我们三人小组中的一员,但是我必须遗憾地指出,他并非莱斯特大学的人员。导言阐释了本书的核心,指出了外交理论的特点,并且突出了后几章中将要出现的主要论题。章节是按年代排序的,每章的结尾处都给出了针对补充阅读的指导意见。

杰夫·贝里奇
于莱斯特

致摇摇谢

贝里奇在此向以下诸位的贡献致以真诚感谢，辛犁黼燥杂秦社燥对马基雅弗利章节做了评价，砸罅燥杂秦社燥及 馥燥燥燥燥之燥燥译对黎塞留部分给出了有益的评论，而 粤燥燥燥燥燥对整本书进行了专业的编辑加工。在奥特所著的尼科尔森章节部分，他要对哈罗德爵士的遗嘱保管人、其子 晕燥燥燥燥燥先生深表感谢，正是奈杰尔先生慷慨盛情的帮助，才使得奥特能够接触到哈罗德爵士的文稿。没有这样的慷慨，该章节的写作过程可能不会那么顺利。而对其父亲文稿摘要的引用也得到了他的慷慨许可。奥特同时还要感谢 灾燥燥燥燥燥的女儿 随燥燥燥燥燥夫人，她欣然允许奥特先生阅读了他父亲与哈罗德·尼科尔森的通信。此外，在基辛格章节末尾“补充阅读”的“历史背景”部分，允燥燥燥燥燥提供了书目方面的建议，对此我们也深表感谢。

导 言

摇摇“外交”一词是指国家体系中各成员之间的官方交流渠道。^①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这类渠道主要存在于外交官与领事官构成的网络中,这些官员享受特殊法律规章的保护,长期驻留海外,有些则驻留在国际组织内。15世纪下半叶,这一网络首先出现在意大利半岛;两个半世纪后,随着1577—1578年的明斯特及奥斯纳布吕克会议的召开,该网络在欧洲得到了充分展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间,该体系下的外交遭到空前批评:它被认为是战争或帝国主义的陪衬——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尽管如此,它还是经受住了诽谤,在冷战巅峰时期,通过成功编撰习惯国际法来指导实践,外交又得到了加强。^②

外交主要依赖常规和系统化的谈判^③,它的出现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因为只要权力还是在大多数国家间分布,那么谈判仍然是区分和平与战争的实质。换句话说,只有谈判,才能从追求共同利益的合作中获利,也只有这一活动,才能防止将使用暴力作为解决矛盾冲突的手段。即使战争爆发了,如果要限制无节制的战斗,并且最终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和约,那么也只有谈判是不可或缺的。在组织和协调各国间对话的过程中,外交成了抵御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壁垒,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说是在以国家为基础的体系中运作的一国国内秩序或“政治体系”的相对脆弱的对应体。

虽然如此定位的外交是本论文集的主题,但是关于“外交理论”还有需要进一步论述的内容。相比较于包括国家政治理论在内的其他理论建设的形式,外交理论有其独特的特点,它得益于历史论证,一直以来都存有一种道德的感召力。也许最明显地表达其道德因素

的莫过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外交官必须永远守信于他国政府吗？马丁·怀特主张外交是“国际关系的主导制度”^④，但是即使是这一论断，也不是仅仅——或者说不是主要——为了肯定外交对国际日常事务的变动的影响，而是肯定了外交对维持国际关系的价值。

自从15世纪末外交呈现出其现代特性以来，外交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但在这个意义上，外交理论是薄弱的，其发展是迟缓的。贝伦斯（~~贝伦斯~~）^⑤在分析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外交官订立的条约时，反复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什么是大使？派往谒见不同等级君主的不同使团中，人员等级和随员方式该怎样安排？外交官官衔等级是否恰当？如果恰当，又该采取什么形式？外交官特权与豁免的基础是什么？使馆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大使规范自我行为的原则是什么，特别是，大使必须要诚信吗？^⑥最重要的是，新近出现的常驻使馆是好事还是坏事？^⑦虽然这些问题极少得到全面的思考，并且其答案通常也有欠中肯，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明确的是，这些问题本身是很好的问题。其中大多数至今仍是外交理论的研究起点。

在当时大部分的外交著作中，有些出于厄莫劳·巴尔巴罗（~~厄莫劳·巴尔巴罗~~）^⑧之类的外交官之手，有些出自真蒂利（~~真蒂利~~）^⑨之类的法理学家之手，还有些出自格劳秀斯之类集两重身份于一体的人之手。同时也是为了服从于“君主明鉴”的主流，结果，直到16世纪末，关于外交的讨论还是倾向于围绕“完美大使”及其在国外的复杂法律地位之类的话题。但是明斯特及奥斯纳布吕克会议之后，外交理论有了更明确的政治意味。在那次会议上，欧洲的统治者们产生了一个共同兴趣，试图规范他们之间多战的“对外”关系。当时，代表“欧洲”松散联盟组成部分的大量使馆开展着一系列持续的联合行动，而人们也开始对此给予集中关注。这点在威克福百科全书式的分析中特别明显，他强调大使与其他公使日常涉及的工作制度，为外交豁免方面“万国法”的研究增添了令人振奋的东西。卡利埃又以简洁明了的方式对这一新兴关注点作出了相当精辟的表述。他在1529年的里斯维克（~~里斯维克~~）^⑩会议时代写作，是他首先也最明白地阐释了各类国家事务问题上的会议外交，也是他令人心悦诚服地阐明了外交对欧洲国家体系的不可或缺性。

与威克福和卡利埃相比,选择另七位外交思想家是因为他们对外交这一特殊活动引出的问题所作的理解。先孤立再结合起来看,对这类“经典著作”的深入思考有哲学和历史学的双重原因。当然,本书所集合的作者也反映了外交理论的变革。正是因此,文艺复兴后的每个世纪都有一位代表人物。另外,关于这些很难获取的经典著作的诠释性论文,我们始终觉得其效用有限。因此,以下章节中所列的所有主要书目都是近期出版或是在藏书丰富的大学图书馆中可以获得的。即使原著文字不是英语,也都能获得翻译版本。

现代早期外交研究者们所关注的一些问题都已经提到了。这些外交理论研究所涌现的主题,时至今日,仍然值得再花些时间思考。最主要的问题集中在这样一种认识上——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不可能放心地单单通过武力来实现或维持其目标。虽然马基雅弗利敏锐地意识到“纯粹的外交”是不够的,但是他在这样表述时,还是很赞叹瓦伦蒂诺公爵在特快信使上花费的大笔开销。黎塞留考虑到外交对提升法国利益至关重要,认为外交必须要“坚持不断”。基辛格同样也相信外交的获利性,虽然他曾是国家安全顾问,后来又是国务卿,但是他从未忽略任何一个重要谈判的核心和细节。

如果外交工作开展顺利的话,就会有很强的优势。这一论断一旦被接受,就引出了一些相关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认为在外交中没有例如追求和平之类的“真实目标或目的”,虽然追求和平曾是中世纪思想的重要元素。^⑧作为完全中立的工具的化身,外交官必须支持本国的对外政策,无论这一政策的内容如何。如果公使被要求进行进攻性联盟的谈判,那么就做得这么做。第二个问题就是认为谈判必须等待“恰当的时机”,在圭恰迪尼提出这一论点几乎五个世纪后,该论点又被斯堪的纳维亚和其他地方的和平研究机构重新发现并发扬光大了。和其他人一样,他还强调谈判要秘密地进行,当然这要冒着丧失诚信与难于妥协的危险,而如果没有妥协,谈判就会陷入僵局。第三,如果与本国利益不符,外交官不必遵守对他国政府所做的承诺。但是,马基雅弗利开诚布公地指出,撒谎与享有良好信誉,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第四,格劳秀斯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他认为外交工作的连续性是很有意义的,同时,在战时的敌人之间、平时时

期的朋友之间能开展持久的而不是零星的谈判,这也是很有好处的。第五,当劝说、收集情报、条约谈判成为大使的主要职能时,其代表性任务也不仅限于微不足道的仪式作用。在某国的宗主国或保护国中代表该国家,就是庄严声明了这个以主权名义活动的国家的独立。

除前文所述之外,还很有必要记住,有这样一种思想张力始终存在着:一方面外交的必要条件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而另一方面又始终在阐述外交的必备需求。在那些尼科尔森所说的“法国体系”的外交中工作的人里,人们能发现一种对“完美外交官”特质的深深迷恋的情绪。紧跟着卡利埃而发展起来的对外交需求的兴趣,必将得到有效组织并且更具专业性。这是伴随着以下观点的深入确立而形成的,即国际法赋予外交人员的特权与豁免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特权的保护,就不可能有效地开展外交活动(这一观点在格劳秀斯那里就很著名了)。^⑨

最后还需要确认外交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即外交理论把外交作为一个独立的——或者说至少是独特的,有时还是孤立的——影响对外事务的因素。主题专业化的必然结果,就是外交不再只是简单的劝说、监听或讨价还价。这一点在卡利埃那里就被发现了,从萨道义一直发展到尼科尔森,但是在基辛格那里一度不见了踪影。^⑩相反,它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上述任务的同时,作为协调和文明化国家总体行为的效用也得到了最大化。诚信处事因此必须遵守,即使这也许并没有带来及时或切实的收益。虽然不是不惜代价,和平的维持必须具有高度的优先权。必须深入研究条约并认真遵行,不仅仅是为了防止对现状的争议,也不仅仅是为了将注意力从较为严重的事态上转移,而是为了帮助缓和与平息国家间关系。简而言之,可以说外交既是一项文明的行动,也是一项文明化的行动。

虽然本书几位作者的观点立场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行文过程基本相似。每一章都从相关作家的生平描述开始,其中包括其外交实践总结。之后提到的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其中一些被单独列出以作全面分析。如果这些文章能够使那些对外交及其理论架构感兴趣的人重新燃起对相关作家的兴趣的话,我们将对此深感欣慰。

► 注释

- ① 即一种分配状态,其成员在其中保留主权,但是——带着或多或少的热情——作为整体中的一部分行动。
- ② 1815年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 1863年的《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
- ③ 在 19世纪末埃德蒙·伯克(1732-1800)创造“外交”这个术语之前,“谈判”一词通常被用来描述大使的工作。
- ④ 1815年《维也纳公约》第11条规定:“外交官在外交官的领土上享有特权(豁免)。”
- ⑤ 1815年《维也纳公约》第11条规定:“外交官在外交官的领土上享有特权(豁免)。”
- ⑥ 又见 1815年《维也纳公约》第11条规定:“外交官在外交官的领土上享有特权(豁免)。”
- ⑦ 马丁利(1815年)也注意到了这点,指出一些作者认为常驻制要对外交的道德贬值负责。
- ⑧ 1815年《维也纳公约》第11条规定:“外交官在外交官的领土上享有特权(豁免)。”
- ⑨ 后者后来被认为是外交特权与豁免的功能理论。
- ⑩ 除去他自己对变革性国际环境中外交角色的考虑。

远

第一章

马基雅弗利

杰夫·贝里奇

尼科洛·马基雅弗利(~~马基雅弗利~~ ,
1469年生于佛罗伦萨共和国,是政治学理论领域的杰出人物,但是他关于外交学的著述就鲜为人知了。这点并不奇怪,因为从表面上看,他在外交学方面的思想论著是很贫乏的。当时常驻使节制已在动荡的意大利各城邦国中诞生并传播,外交也由此经历着变革。恰恰在那些年里,马基雅弗利的思想进入了成熟期。他于1527年逝世,而那时,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制度的确立已经超出了阿尔卑斯山地区。对于身处那一时代的马基雅弗利来说,忽略一些原可以直接或间接指出的外交学方面的思想,可能真是太草率了。无论如何,就像迈内克(~~迈内克~~)所说的,马基雅弗利是“第一个揭示‘国家利益至上’(~~国家利益至上~~)原则真实本质的人”,并且就表面判断,这一学说在关于大使的行为方法中有相当可观的应用。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哈罗德·尼科尔森在对“意大利体系”的外交进行描述时,特别强调了马基雅弗利的著作,不仅是因为它们所揭示

的内容,而且还因为它们对外交产生的影响。^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一般方法,即在他的著作中标志着打破了经典政治哲学的强“现实主义”,“几乎”在两个世纪以后才被亚伯拉罕·德·威克福——关于古代政体中外交实践方面最伟大的手札的作者——所仿效。尽管冒着“人们可能会被毁谤”的风险,荷兰人还是公开赞赏这位佛罗伦萨人并且推崇他的作品。^③以上就是本书之所以以马基雅弗利为开篇的理由。

苑

▶ 马基雅弗利的外交生涯

不仅是马基雅弗利生活的时代环境给了他非凡的机遇来观察外交活动,此外,他生长的家庭虽然属于中等环境,但是在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中却占有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重要地位。^④1498年,尽管先前没有任何行政经验,年仅39岁的马基雅弗利还是被任命为共和国第二秘书厅秘书长。^⑤这一职务的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佛罗伦萨各属地的的事务,但是在担任此职后仅一个月,马基雅弗利又被指派为共和国十人委员会(自由与和平委员会)*¹秘书。这是佛罗伦萨政府里一个有影响力的小组委员会,即执政团,承担对外交事务的管理。也就在那时,即法国入侵意大利半岛造成骚乱仅四年后,他步入了外交领域。

第一国务大臣马塞罗·阿德里亚尼(阿德里亚诺·曼迪奇奥)也是大学的一名教授,并且“对希腊的诗歌要比对意大利的政治更感兴趣”^⑥。因此,马基雅弗利在十人委员会里发挥了超出他正式职务范围的决策作用。大量的信件往来于他的书桌,他也必须撰写许多文书,特别是对大使工作进行指导。^⑦1501年后,他实质上也是共和国的防务大臣。^⑧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最感兴趣的是,马基雅弗利要经常代表十人委员会出国,不仅是到意大利内部各公国,还远至法国和德国。他的传记作者里多尔菲(里多尔福)这样描述马基雅弗利的不同角色:“有时,……或者出于节约开支,或者由于事务的特殊性,或是其他

* “自由与和平十人委员会”,简称“十人委员会”。——译者

原因，政府不希望派遣真正的大使时，他们（秘书或国务大臣）就受外交代表团甚至使馆的委托。肩负这些使命而被派遣的国务委员，不是被称为大使或是演说家，而称为公使。他们不是被派去参加和平条约或同盟协议的谈判工作，而只是观察和报告，或是就急迫但并非最重要的事务进行谈判，或是为正式选出大使做准备工作，或是为了陪伴、协助、监督大使或为大使出谋划策。”^⑨黑尔（~~勾稽~~）做了最重要的总结，他指出与大使相比，只有公使才能“最清楚地看见国际关系中的阴暗面”^⑩。

这样，马基雅弗利就以“佛罗伦萨秘书”闻名，并也乐于以此闻名。这个称呼的得来主要是由于他事业的主要部分其实是外交官工作，即使出于本性的缘故，无论是作为观察员还是谈判者，他似乎都愿没有达到最高的职业标准，^⑪同时他也不曾常驻，至少不曾驻留某地超过六个月。马基雅弗利在 ~~员源~~ 年的上半年受雇于两个意大利的外交使团，但是第一份外交使团的工作没能做到 ~~员源~~ 年 苑月。那时他去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联合宫廷，在那逗留了近半年。~~员源~~ 年 远月，马基雅弗利在出使乌尔比诺* 时，向福特拉** 主教弗朗切斯科·索代里尼（~~云~~）提出了“审慎增援”的建议。^⑫当时，乌尔比诺被切萨雷·博尔贾（~~悦~~）占领，博尔贾通过其父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被任命为罗曼那公爵。这位正处于其权力顶峰的“瓦伦蒂诺*** 公爵”，企图在与佛罗伦萨交界的无政府地区为自己开辟一片领地，并且决心坚决“保护”这片土地。紧接着，马基雅弗利独自拜访了这位危险的公爵。~~员源~~ 年 员园月 苑日，马基雅弗利来到了他位于伊莫拉**** 的宫廷，并且在那逗留了四个月，借口等待法国方面的批准，实为密切观察博尔贾，特别是那时博尔贾正对维泰利*****

摇摇* 摇意大利中部城市，位于佛罗伦萨以东。——译者

摇摇** 摇意大利中部城市，位于佛罗伦萨西南。——译者

摇摇*** 摇位于法国东南部罗讷河流域，该公爵领地都城位于今日的瓦朗斯。——译者

摇摇**** 摇意大利中北部城市，位于佛罗伦萨以北。——译者

摇摇***** 摇梅塞尔·尼克洛·维泰利，雇佣军队长，在教皇西斯托四世死后，收复并统治卡斯特洛市。——译者

和奥尔西尼*进行野蛮报复。^⑬其后,马基雅弗利身负重大使命出使罗马(1494年11月—1500年11月)、法国(1494年11月—1500年11月)以及德国(1500年—1505年)。他的最后一次外交使命是在1505年11月佛罗伦萨共和国解体前。^⑭那次他被派往米兰,然后又一次回到法国,目的是向法国国王请求延缓宗教分裂派亲法主教集会的召开,这些主教把罗马与佛罗伦萨的关系搞得相当复杂。^⑮

直到1505年,马基雅弗利一直担任公职。当时西班牙军队应教皇之邀,帮助意大利成功驱逐了法国的入侵。在这一事件中,佛罗伦萨共和国没有站在胜利者的一边,为此付出了代价。美第奇家族复辟,共和国解体了。1505年11月,马基雅弗利被解职并被判流放。后来的时日,磨难接踵而至。他被控共谋推翻新政体,遭受严刑拷打而入狱。不久之后,在为庆祝美第奇家族一成员当选教皇而颁的大赦令**中,马基雅弗利得到开释并准予过隐居生活。

相关作品

马基雅弗利于1495年写的一封后来题为“给拉法埃洛·吉罗拉米(1490—1547)大使出使帝国的建议”^⑯的信,是他唯一一次直接而持久地对外交给予关注,即针对开展外交的环境所持的态度。他确实有一部外交文书的大合集,即众所周知的《驻外公使论集》(1500—1505),后来被称为《通信集》(1500—1505),使用《通信集》这个名称,因为它是通常参考的翻译文本。^⑰然而《通信集》最近才历经艰难被引入到英语读者面前,所以要从理论重要性的角度阐述它的精华所在并非易事。^⑱当然我可以在本章以大量篇幅围绕这一点展开,

摇摇* 摇奥尔西尼(1490—1547)也有写作 韵译参见马基雅弗利著:《君主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00页)家族,15世纪在罗马兴起,雇佣军队长世家,受雇于切萨雷·博尔贾。——译者

摇摇** 摇指1500年枢机主教乔瓦尼·德·美第奇升任教皇,称利奥十世,此时颁布的大赦令。——译者

但是也有提议以《君主论》(马基雅弗利著^①)作为本章的主要对象,或者以其最长、最重要的著作《论提图斯·李维著 罗马史 前十卷》(即《李维史论》,简称《史论》)^②(马基雅弗利著)为本文的基础。马基雅弗利的最后一部伟大作品是《佛罗伦萨史》(马基雅弗利著^③)。这些书都是他在被迫离任过隐居生活时的成果,向我们展现了大量马基雅弗利关于外交的看法。

外交、暴力与共和国扩张

马基雅弗利关注国家——特别是共和国——及国家安定的基础条件。他由此也着眼于考虑国家间关系。因为外部环境包含一些可能毁灭国家自由自主状态的大敌。所以针对外部威胁所采取的对外交政策影响着其国内政治,而这些影响的重要性不容小觑。

马基雅弗利认为,从表面上判断,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最佳对外立场是:在军事上强大到能阻止任何侵略行为,而又不至于先发制人挑起冲突。他同时还提议,要通过立宪声明进一步约束后一种可能性。这种声明需要有力的事实加以支持,也就是要表明该国没有向其邻国扩张的企图。很不幸,马基雅弗利所说的这种介于最强与最弱之间的“中间道路”,在“一切人类事务都如潮水般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里似乎是行不通的:“必要性”使国家总采取不合“理”的政策。例如,尽管扩张政策会导致国家最初并不想要的恶果,但必要性还是使国家扩张——也许是出于自卫的理由。另一方面,就算中间道路导致长时期的和平,结果也不见得会更好。因为长时期的和平“要么使(国家)变得柔弱,要么产生分裂的政治派系”^④。

摇摇考虑到这些问题,马基雅弗利总结道:“在组建共和国时,人们应当考虑有没有可能让它扮演更高尚的角色。”这要求国家宪法能在贵族与平民之间划分权力,国家要武装平民并乐于壮大平民的力量;同时如果需要的话,也会将帝国主义政策付诸实践。^⑤在这一过程中,贵族与平民的意见虽然时有不和,但这种纷争将会创造“有利于自由的法律”^⑥。倚重本土士兵会比倚重雇佣兵培养出更好的臣

民与士兵。^{②4}当然,马基雅弗利是以古罗马共和国及其帝国为模型的,而该帝国的诞生是依靠霸权而非结盟或直接征服。^{②5}外交^{②6}与这一理论的契合点体现在哪里呢?

马基雅弗利运用了这样的基本假设:战争的技巧,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比任何其他东西——包括外交技巧在内——都重要,因为他坚信“可靠的法律”产生于“可靠的武装”^{②7}。然而,国家并不总具备充足的军力来达到其目标。出于这一需求,外交应运而生了。这也就是“君主在发迹之初应该做的”,马基雅弗利还告诉我们,“在军事力量足够强大并在单凭武力足以竟其功之前,外交是共和国始终要借助的手段”^{②8}。一个国家如果像15世纪意大利的中等国家那样军备武装薄弱、战地指挥不当,那么无论是共和国还是君主国,都不可避免地应当在“欺诈、……诡计和阴谋”^{②9}上下功夫。马基雅弗利虽然认为国家想强大只能依赖武力,但是很显然,他也相信对于一个希望“做大事”的君主来说,即使他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军队,外交对其来说还是有重要意义的。^{③0}因为审慎的态度能约束军队的过度扩张。我们知道“罗马人从未同时发动两场大战”,相反,他们选择一次实施一项军事任务,而与此同时“努力维持与其他各国的安定关系”^{③1}。

▶ 人性、诚信与外交

一方面马基雅弗利力陈对外交发展的持续需求。另一方面,他的职业经历和史籍阅读培养了他的另一种看法,在某些情况下,这也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看法:外交是男人们(及女人们)^{③2}都特别愿意从事的活动。^{③3}马丁利(配译:马丁利)在此指出,马基雅弗利不考虑人们行动前是如何思考的,只观察人们是如何行动的,他认为人“自私、……懦弱、贪婪,且最重要的是愚蠢无知容易上当受骗”^{③4}。在这一点上,很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基雅弗利的著名短剧《曼陀罗》(配译:曼陀罗) (配译:曼陀罗)。麦考利(配译:麦考利)勋爵认为^{③5},该剧的“辉煌”之处在于梅塞尔·尼西亚(配译:梅塞尔·尼西亚)这个人物。他是一个受过教育却仍被愚弄的傻瓜。在一个年轻绅士、一个势利小人和一个贪财的修士的联合鼓动下,梅塞尔默许他的漂亮妻子与她所崇拜的这个年轻绅士

通奸。^③

君主制下的臣民们卑贱低下、轻信他人，这使他们在国家间的交往过程中，也像梅塞尔·尼西亚一样脆弱，易于轻信高明外交官的如簧巧舌，受制于他们的金钱利诱。无论这位外交官是从自己君主的利益出发，想使他国臣民站在自己一边，还是想获取可靠情报，他们都能成功。在 1517 年两次出使路易十二的宫廷期间，马基雅弗利都中肯地向佛罗伦萨政府指出：“在这里交朋友的重要性，这个朋友当能出于金钱之外的动机，愿意站在您的立场上，关注您的利益，并且作为您在这儿的代表为您尽忠……”这位佛罗伦萨秘书接着说：“这种方式就是比萨人保护自己所用的武器，就是卢凯塞（~~德意志人~~）人攻击您所用的武器；也就是威尼斯和（拿波里的）弗里德里克国王和其他所有与这个宫廷相关的人，自行解决问题时所使用的武器。而那些不采取同样做法的人，可以说是想赢官司又不想付律师费。”^④两年以后，马基雅弗利又请求政府说服佛罗伦萨的商人向瓦伦蒂诺公爵的驻外办事处官员行贿，因为“如果我对国务处的那些办事员不满意，我决不会再信赖他们去办任何事情，特别是机密事务”^⑤。

在关乎其切身利益时，每个人都会被贿赂、胁迫或欺骗。这样，外交官就能在外国宫廷施加自己的影响，并且因此提升其政府的计划目标。人类的卑贱成就了外交，这就是马基雅弗利颇具说服力的断言。但是这样的腐败行为也是有两重性的。看到这一点，特别是在应用“目的证明手段”^⑥这一原则时，马基雅弗利叮嘱君主，逃避这种博弈是不可能的。既然人们“对你不能守信不渝”，他坚称，“你也就没有必要对他守信”^⑦。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最著名的一句话也许就是：“一个审慎的统治者……不能，也不应该在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信守诺言，而当作出诺言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时，也不应当再信守诺言。”^⑧守信与否通常与实力有关，马基雅弗利某次出使瓦伦蒂诺公爵的领地时指出“君主间的联盟只能靠武力维持，因为只有军事实力才能保障信用的延续”^⑨。现在，至少有通过谈判达成条约的愿望能促进外交的发展，但是如果条约没有得到重视（至少是当作一般原则来加以尊重），这种促进就没有意义了。马基雅弗利的现实政治与外交的内涵是一致的吗？